

圆桌对谈

好的科幻文学从来没有脱离叙事的人文底色

主持人

黄悦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教授

与谈人

石一枫北京作协副主席

陈楸帆上海作协专业作家

丛治辰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

石一枫

陈楸帆

丛治辰

黄悦

想象力的“时间差”正在被现实清零

黄悦:中国科幻文学界长久流行“硬科幻、软科幻”的二元划分,将科学设定含量作为评判科幻优劣的标尺。这里面存在对科幻的窄化或矮化。从艺术标准来看,该分类是否成立?科幻文学与严肃文学在艺术内核上有无清晰边界?

石一枫:从艺术手法、叙事目标来看,科幻文学与传统现实题材创作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。以我自己的创作为例,《地球之眼》的远程监控、《人魂枪》的游戏、《一日顶流》的互联网生态等,这些科技早已成为当下人们日常生活的现实。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,科技成为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重要驱动力。小说从来写的都是生活的变化。写古代生活题材的作家可以考虑物质基础、生活环境、人际交往等要素,但现代社会的基础前提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,我能做的无非是在小说中将科技因素放大而已。另外,在探讨科技伦理或者其他话题时,文学、哲学、社会学等不同的学科各有各的角度。文学的独特性是还原生活、还原人物,在具体的生活领域里探讨问题,通过故事写出我们对这个时代变化的看法。无论科幻小说还是严肃文学,好不好都不取决于题材类型,而要看创作者能否搭建独一无二的叙事逻辑,能否生成新鲜的审美体验。

陈楸帆:我曾多次谈过这个问题。“软科幻”“硬科幻”是外来类型标签,本质是对科幻文学审美空间的窄化。科幻创作非常广阔多元,不应被简单地划分为“软硬”对立的两极。关键是要将设定与所要表达的故事自然有机地结合,而不是割裂开来。当前,技术迭代的周期越来越快,“科幻现实主义”有了新的注脚,科幻作家想象力的“时间差”正在被现实迅速清零。无论写科幻还是传统现实题材作品,都要共同面对一个严峻命题:在变与不变之间,如何寻找文学性生长的新空间。

丛治辰:我个人不赞同软硬科幻的分类。科学设定只是外壳,真正支撑作品传世的,还是内在的人文审美内核。今天我们要用全新视角来看科幻文学的文类特性,将科幻文学并入更大的文学传统和人文审美谱系,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:第一个层面是对自然科学的技术想象,用科学构想制造猎奇意象和幻想体验;第二是社会推演层



面,借幻想架构反乌托邦、理想国叙事,对人类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结构进行理性审视;第三个层面是对人类思考方式的想象与批判,以虚构世界的方式追问善恶、个体、共同体的本质。在后两个层面上,严肃文学与科幻文学是共通的,这都是建立在人类历史、现有基础及未来可能性基础上,对人与社会的整体思考。

科幻是神话的当代变体

黄悦:我觉得学界长久以来存在一种误解,即将科幻与神话对立起来:未来属于科学与理性,神话只能陈列在博物馆里供人瞻仰。但国内外幻想文学研究一再揭示,科幻与神话共享同一个精神内核,就是那种“有意与现实拉开距离、制造悬而未决的不确定性”的诗学能力。超前的科技在叙事中与魔法无异,都是现实中无法掌握的力量,科幻的魅力正来自这种认知差异。你们怎么看科幻、神话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?

陈楸帆:神话可能是古人的科幻,科幻也可

以是当代的神话。当人类面对巨大的、无法掌握的事情时,他们在认知、情感甚至更深层次的思维模式上是一致的,即通过想象和虚构的叙事来探索和解谜。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书写乡土、宗族、民俗的时候,往往依托写实笔法,而科幻能将本土文化符号进行转译,完成新的审美创造。这两年我有意识地结合潮汕地域和文化传统来创作科幻作品。我写《重生的金漆木雕》,将非遗工艺、祠堂与虚拟现实、AI并置;《英歌飞腾》也把英歌舞带到了外太空。我想借此探讨,我们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在另一颗星球上会遭遇什么,意味着什么,由此反思文化传统在乡愁与文化传承之外,是否意味着更多层面的意义?比如潮汕的非遗手工金漆木雕,未来有一天能被人工智能量产,这与原本贯穿工匠精神的手作物质载体是否一致?其中有哪些被保留了,哪些遗失了?人在其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?这就涉及AI能为人类做什么又不能做什么的议题,这始终是我渴望通过写作探讨的话题。

丛治辰:神话是一个民族初生时候,在特定场合用特定方式告诉我们从哪里来、世界如何创生的载体。神话渗透于我们的日常认知,潜移默化塑造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。神话是理性的叙事,能讲出一个有因果、有逻辑的完整故事,但同时其内核是神秘的,并不真正抵达事物本质,却让人得以安然生活。当然在今天,神话这个词的意义早已经泛化了,甚至有了消解一切的批判意味。我们要做的是反思“神话”本身,借此判断自己认同什么、边界在哪里。

黄悦:前不久,全球最先进的AI厂商之一Anthropic同时发布了两个同源模型,一个命名为“神话”(Mythos),一个命名为“寓言”(Fable)。两者共享同一副“大脑”,区别仅在于安全护栏的收放:“神话”能力全开,“寓言”则在网络安全、生物等高危领域主动降级。耐人寻味的正是这套命名法本身。一家以理性、可计算、可对齐为立身之本的技术公司,在为自身强大的造物命名时,本能地伸手去够的,不是任何一个科学术语,而是“神话”与“寓言”这两个古老的词。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诗意,而是一个症候:当科学抵达自身能力的边界、触及那些“不敢确认的后果”时,它仍然选择借神话来命名自己。这也正是“科幻是当代人的神话”这一命题最新鲜、最生动的注脚,它不再是隐喻,而是眼前正

在发生的事实。

那些不能被AI通约的存在,就是文学

陈楸帆:我进入这一行很早,眼见着AI在这不到10年的时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AI能做什么、不能做什么,包括跟它的协作过程,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写作到底是什么、文学到底是什么。其中涉及边界的问题。按照我现在的想法,AI写作非常表面和初级。可能更核心的问题在于,写作者要叩问自己的内心:我们写作,到底是为了什么?是为了更高效、更大批量地生产文字产品,还是通过写作这件事帮助自己、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人、什么是人性?所以我现在的写作发生了一些转向,我更渴望回归传统文学的视角,回归到人的视角。

石一枫:科技发展太快了,带来了非常新的挑战。比如,医疗技术发达了,人的身体可以更换“零件”,人能活得更长了。但我始终认为,人类的自我人格是不停变化发展的,人类就是不停地对自我进行修正的生物。我的写作也涉及这一点。但我感觉在传统的写作中,其实越来越难以坚信“人”的存在了。

陈楸帆:恰恰相反,我又回归“人”了。除了上面提到的,文学创作毕竟是人的创作,还涉及作者与读者之间建立的价值契约,这是一种信任关系。读者阅读你的书是因为信任这个写作者,其中呈现的是作者独特的认知、审美和价值观。在人类署名却假手于AI的文学创作中,这种契约精神就被破坏了,所以这不单单针对写作所产生的文本本身,还涉及读者消费和接受美学,会对整个文学创造的生态系统产生影响。

丛治辰:AI的诞生加速了同质化的文学创作,这是一种低智的写作。我认为,文学还是存在不能被人工智能通约的东西,那就是细节。不仅仅是文学叙述上的细节,而是深入到具体而微的人类社会、人际交往当中,能洞见人性的特别细致的时刻,这些时刻是毛茸茸的,只有文学才能提供。优秀的文学作品,通过想象创造出比现实更细致以及更尖锐的东西。创作前作者本身就有相对充分的思考,优秀的作品也会促发读者在自身的经验层次上的对话性,最终产生更广阔、更深远甚至作者也始料未及的思想性。这些不可化

声音

AI无法知道——

我们说“石头”时,它的重量、粗粝与冰凉

秦三澍

人工智能与诗歌的未来,事实上已然置身于一个结构性的悖论之中:一方面,就在此刻,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以惊人的速度与规模生产着“文本”;而另一方面,我们却愈发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“意义的匮乏”。在人工智能的无限丰饶面前,诗歌这门最为古老的语言艺术似乎反而滑入了一种近乎失语的状态。它究竟是缪斯的当代表征,还是人类诗歌的终曲?

要回应这一问题,我们或许需要回到一个常被混淆却至关重要的起点:AI并不“写作”,它只是“生成”。AI生成的诗,本质上是一种“对表征的再表征”。它的材料并非“世界”本身,甚至不是主体对世界的直接经验,而是既有文本的统计性结构。它的机制不在于感受,而在于计算;它无法通过感知与现实建立联系,它处理的始终只是符号,而非对象。

正是在这一意义上,AI构成了一种能够汇聚全部既有书写、重组所有语言资源,却无法感知哪怕一瞬现实的“语义机器”。然而,要想对这一“语义机器”有更充分的理解,我们必须将其置于技术演化的谱系之中加以考察。从早期基于规则的“组合生成”,到当下基于深度学习的“归纳生成”,其间存在着一条真正意义上的技术断裂。旧式生成器所产出的文本,不过是作者在代码中预设的可能性空间;而新式生成器,则将训练数据本身转化为创作材料和生成机制的内在条件。这意味着,在当下的语境中,“作者性”已被根本性地重写:写作不再是从经验出发的表达,转而成为对既有文本的统计性挪用。

由此,哲学家达里奥·孔帕尼奥给出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比喻:当代聊天机器人,如同一个看过所有爱情电影、读过所有爱情文本、熟悉全

部爱情话语,却从未真正爱过的人。这一比喻为我们理解AI诗歌提供了决定性线索:AI可以高度逼真地再现关于爱情、悲伤、自然或死亡的表达形式,却无法写出那些只在经验发生之后才可能生成的语言。它无法知道,当我们说“石头”时,这一词语所携带的重量、粗粝与冰凉。

但这是否意味着,AI在诗歌领域中毫无价值?恰恰相反。关键在于视角的转换。与其将AI理解为一个拙劣的“机器作者”,不如将其视为一种尚未被充分开发的“机器媒介”。事实上,在公众广泛讨论AI之前,一些数字诗歌的先驱便已展开自动文本生成的实验。法国理论家菲利普·布茨则进一步提出“过程美学”,将“自动生成”厘定为一種认知批评装置。他区分“综合算法”(语言计算)与“实现算法”(呈现控制),并指出,当分析重心从前者转向后者时,我们便进入“过程生成”的领域。在此,诗歌不再是静态文本,而成为不断生成、瞬间消逝的“文本事件”。布茨将这种在程序执行中显现的短暂视听形态称为“可观察暂态”:它仅存在于当下,无法被完整保存或复现。正是这种对“呈现”的优先性,催生了所谓“挫败美学”。由于实现算法在不同技术环境中的不稳定性,作品的最终形态不可完全预见,“被编程的美学”并不等同于“被期待的美学”。对读者而言,这种不可预测性构成了一种中断机制:阅读预期被打断的瞬间,恰恰成为反思阅读习惯的契机。在这一意义上,AI不再服务于审美愉悦,而成为一种揭示认知边界的装置。

如果说布茨从技术诗学层面揭示了“生成”如何转化为事件,那么许煜则从哲学层面深化了这一问题。在他看来,AI所触及的无限,本质上是“数学的无限”,即一种通过递归与同质重复展

开的黑格尔意义上的“坏的无限”;而诗歌所指向的,则是一种“审美的无限”:在有限形式中铭写无限的努力。这一差异具有决定性意义。AI可以生成无限数量的诗句,却始终停留在可计算的递归结构之中。它无法抵达真正的诗之经验:在词语之间的断裂处,在突如其来的沉默之中,一个世界向我们敞开。AI或许可以写出无数关于山水的诗,但它无法让我们“看见”山水——因为这种看见,



是身体、感知与时间的一次不可替代的相遇。

最后,我希望将问题从技术一作者的层面推进至文明层面,尤其是跨语际实践的维度。当我们谈论“人工智能与诗歌的未来”时,这里的“诗歌”是否仍维持着单数性?“人类”是否仍然同质?

约的审美颗粒度,是机器无法复刻的艺术核心。所谓“毛茸茸”的细腻人性瞬间、私人化的情感痛感、创作者独有的价值取舍,都构成文学独有的细腻审美层次。而且,我们的现实从来都比文学更“文学”。长期以来,我们在现实题材文学作品中读到的传奇都来自生活的传奇。既然现实提供的新奇一直都比小说多,那小说的价值在哪里?我认为,在于深度思考与艺术加工。我们对散乱、传奇化的世界进行了整理、提纯和艺术加工后,其母题变得更加尖锐、更加典型、更加复杂,这对所有文学类型都是适用的。

石一枫: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应该真的带人“重活”一遍。现实题材写作经常能从相对细节的地方找到新的切入点,科幻作品往往能从宏大叙事里面找到新的发现。但如果老是陷入固定套路,元宇宙、生化改造、星际战争反反复复用,艺术价值就要大打折扣。传统现实题材如果始终在老调重弹,同样也不具备长久的审美生命力。

丛治辰:这个我有点不同的想法。不是说现实题材文学写出了细部,科幻小说写出了宏大的东西就叫互补,而是说宏大的部分一定能够烛照到细节,一下子改变细部的光彩,这才叫互补。比如,《三体》里“黑暗丛林法则”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,体现在微观细节上,会刹那间改变读者对很多东西的认知。如果说科幻小说是宏大的,那是因为它提供了某种普遍性思维的转变,同时可以照亮很多最细微的东西。比如《三体》里的章北海,刘慈欣用很多细节刻画这个人物,但最关键的是写出了人性在极端时刻可能会出现变异。一言蔽之,好的小说是在面对具体而微的细节时,让人产生深入的思考。这种思考可以在一以贯之的日常生活范围里,也可以放置在宇宙、星空这样宏大的背景之中。只是大家思考的路径不一样罢了。

黄悦:大家的对谈都很精彩。作家以科技为手段,突破现实,以更为极端的方式展开人类学和宇宙哲学的思考,其潜在的认知价值也体现在对古老故事结构、叙事模式和认知边界的重申上,因此好的科幻文学从来没有脱离其人文底色。

(本文系北京文联“坊间对话第47期:科幻文学的未来想象与现实关怀”摘录,内容有增删,由本报记者康春华编辑整理)

言的差异,消解经验的粗粝,最终生成一种被模型所认可的“通用诗性”。

AI承诺缩短从创意到实现的路径,但也可能使我们失去诗歌最核心的维度——那种缓慢、反复、充满摩擦的意义生成过程。至此,我们才真正抵达问题的核心:诗歌的未来,不取决于技术,而取决于选择。我们是被动接受一种被均质化的“全球诗”或“通用诗”,还是主动去发明、守护那些不可算法化、深植于具体生命经验的诗歌?AI并未消除作者,而是重新分配了创造的位置:人类不再只是执行者,而成为意向的源头、意义的裁决者与伦理的承担者。这正是诗人不可被替代之处。因此,这并非一个悲观的结论,而是一个行动的起点。正如布茨所言,数字文学不是“机器的文学”,而是人类重新占有机器的事业。AI可以成为镜子、对话者,甚至是挑战诗学的扰动者。但我们必须清醒:它是一个强大的语义工具,同时也是一个缺乏身体与经验的存在。

诗人,始终是那个在语言与世界之间徘徊、凝视并赋予意义的人。当算法趋向完备,当一切风格都被归约为模式,文学或许将滑向一种计算机化的“新的古典主义”,正如卡尔维诺所预言的那样——对既有之美的无限复制。而我们面对这些文本,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一种“恐怖谷”效应,一种源于过度相似而产生的不安。然而,正是这种不安,这种迟疑,这种无法被完全同化的经验,构成了诗歌最后的防线。诗歌的未来,不在于我们是否学会与机器一起写作,而在于我们是否依然敢于在那个机器沉默的地方,用我们颤抖的、充满歧义的声音,说出第一个、也是最后一个词语。

(作者系诗人、译者,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)